

近世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

中央研究院
宋光宇博士

在十七世紀上半期，中國的局勢動盪不安。人們對於太平盛世的憧憬日益加深。這種憧憬就是有關彌勒降世的信仰。根據佛教『彌勒下生經』的預言，彌勒再來世上為王的時候，世界將是非常美好。在明末亂世，就有了「龍華三會」和「三期末劫」的說法。這兩說法又跟羅教的「無生父母」概念合流。發展一套全新的「無生老母信仰」。代表作品就是『考證龍華經』

。這個信仰是說：人都是無生父母（無生老母、瑤池金母等）的皇胎子女，降生東土後，惑於爭名奪利，以致迷失了原來善良的本性，也不認得回到天上家鄉的路徑，在天上家鄉的無生老母於是日夜涕泣，思念子女，曾經派燃燈佛（青陽期）和釋迦佛（紅陽期）下凡渡化世人。各渡兩億世人，還有九二億皇胎子女等待救贖。目前，正是午未之交，要從紅陽期進入白陽期。彌勒佛以及

天上所有神佛都降世東土，來救渡世人。一時之間，宣稱是救世主的人紛紛建立教門，撰作寶卷，發抒救世之志。也有許多太監出錢資助。造成明末清初，教門林立的局面。其中，最有名的除了羅教及其衍生的龍華教、大乘教、金幢教等之外，當推山東濰州石佛口王森所建的聞香教和弘陽教，河南韓飄高所建的紅陽教。

清廷入主中國，救平流寇及明朝忠貞勢力，天下復歸於

平靜。對於明末的各種教門採取大力鎮壓的態度。各教門爲了生存，都做了生存策略上的調整。目前，我們對於羅教的適應情形知道得比較多些。

在清朝，羅教案前後有幾十次。從辦案的奏摺裡，我們知道，羅教的齋堂是大運河的漕運水手托身養病，甚至終老的地方。例如，清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浙江巡撫覺羅永德的奏摺，講到羅教對大運河水手的功能：

（杭州各菴）係習大乘教，俱不知始自何時。從前有七十餘菴。聞昔年有密雲人。錢翁二姓，及松江人潘姓，先創錢、翁、潘三菴。爲糧船水手回空居住之所。因糧船水手俱係

山東、北直（隸）各處人士。回空之時，無處住歇，疾病身死，亦無處掩埋，故創設各菴，俾生者可以托足，死者有地掩埋。在菴者，俱習羅教。嗣因水手衆多，續又七十餘菴。自雍正五年間，前任李撫院禁止之後，現止存剩二十餘菴。

覺羅永德的這份奏摺清楚的點出，羅教菴堂的生存功能就在於收容那些「外省異籍、飯舖不敢容留」的漕運水手，提供「生者可以托足，死者有地掩埋」的社會救濟服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羅教菴堂就成了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，以求相互關懷」的地方。

江南是十七世紀以來，中

國經濟與財富的重心所在。在北方的京師要仰賴江南的補給。在海運興起之前，大運河是溝通南北的唯一通道。漕運水手成爲國家經濟的重要一環，可是他們的生死和福利却沒有人管。北方的漕運水手到了南方，舉目無親，人難免老病。隻身在外，誰來照顧？羅教菴堂一力承接這個社會救濟責任。在清代，尤其是乾隆年間，對各種教門的箝制非常嚴格。羅教菴堂常被破獲。但抓不勝抓。羅教菴堂仍然存在於大運河沿線和東南沿海地區。究其原因，實是羅教菴堂的獨特功能所致。順便一提的是大運河上的清幫。簡單的說，清幫是漕運水手走私南北貨的組織。羅教則是爲老病水手服務的。

接下去，讓我們來看一看先天道。

在明清各教門中，先天道是比較晚出的一個教門。創教的人是黃德輝（一一六九〇）。他原本是全真道士。後來，揉合了當時普遍流傳的「無生老母」「三期末劫」「龍華三會」等信仰，創立先天道。從黃德輝創教起，到袁志謙（退安老人）的百年間，先天道一直是蝸居在江西鄱陽湖畔的一個小教門而已。道光 年，先天道的十一祖何了苦被官府捕獲，充軍到貴州。才使先天道從江西邁向貴州。何了苦在貴州收了一位先天道史上非常重要的人，他就是十二祖袁志謙。在袁志謙的努力下，先天

道在四川成都建立總堂「西乾堂」。他的徒衆四出傳道，才使先天道成爲全國性的教門。

袁志謙和他的徒衆們活躍於道光、咸豐年間。清廷對於這類教門還是採取鎮壓的手段。袁的大徒弟們紛紛捨身殉道。一時，先天道幾瀕臨瓦解。賴彭水德的主持，才慢慢穩下來。彭之後，先天道趨於分裂。一方面當然是爭奪領導權，另一方面也是對教義和儀式有不同的見解。到了光緒初年，先天道分裂成本派（又有三華堂和西華堂之分）、圓明聖道、東震堂（後改爲一貫道）、同善社、歸根門、混元門……等支派。

從光緒中葉起，清廷對民

間教門的箝制逐漸放鬆。這時，外國列強勢力大增，基督教會勢力凌駕本國各種力量之上，終引發了有名的義和團事件。山東、河北的農民凝聚在「義和拳」這個教門的旗幟下，想要用巫術（法術）來對抗列強勢力。結果是失敗了。辛丑和約的簽訂，中國完全向西方列強屈服，成爲任人宰割的局面。同時，中國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。這種現象表現在受外國教育的知識份子身上尤爲明顯。他們急於從外國引進新的現代文化，以取代舊傳統。對舊文化視如寇讎、棄之如敝履。

在中國幾億人口中，受過西洋教育的人必竟是少數。大

多數的中國人還是過傳統生活，用傳統的辦法來應付外來的挑戰。清末，政府已經無力去

干涉宗教集會。民國肇造後，國民政府一時也無力干涉宗教事務。對民間各教門來說，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。而且，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又處於動亂的局面。三期末劫、龍華三會、等待救主的降臨等宗教訴求點，又主導了中國民間的宗教思想界。一時之間，又呈現教門林立的現象。其中，發展最快的是同善社。流傳於商人階層，而有「紳商宗教」之稱。抗戰期間，一貫道崛起，流連於屬於淪陷區的華北、華中和東北。這種百家爭鳴的現象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時劃下休止符。中共消滅了所有的

「反動會黨門」。仙佛菩薩隨著國民政府渡海來到台灣。

台灣蕞爾小島，一時來了那麼多的教派，競爭在所難免。經過四十年，脫穎而出的是默默修心實踐道德的一貫道。

一貫道之所以成功，原因很多。內在因素以簡化儀式，開方便之門、信徒傳道熱忱高等；外在因素則是台灣工商業發達的結果，打敗了原來的社會結構，人們湧向都市追逐名利。如何再尋得往昔濃醇的社會溫情，得到彼此照顧，進而化解人們心頭的焦慮？是個很緊要的關鍵。再則，台灣經濟成功促成中國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的恢復。民國六十年代是中國人重新找回失落的文化

的時代。但正規學校教育却不能適時作出反應。教傳統四書五經的責任；自然旁落。一貫道適時提供適當的場所，讓有志重溫傳統文化的人得以滿足，也化解了一些競爭所帶來的焦慮。

以上，我們簡單的從社會的觀點，分析了近世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。我們發現，中國人的宗教是生活的一部份，它的功能是在於因應時代的變動，為離開家園的人們，提供心靈上的安慰和實質的幫助，並指引人們的生活方式。（完）

